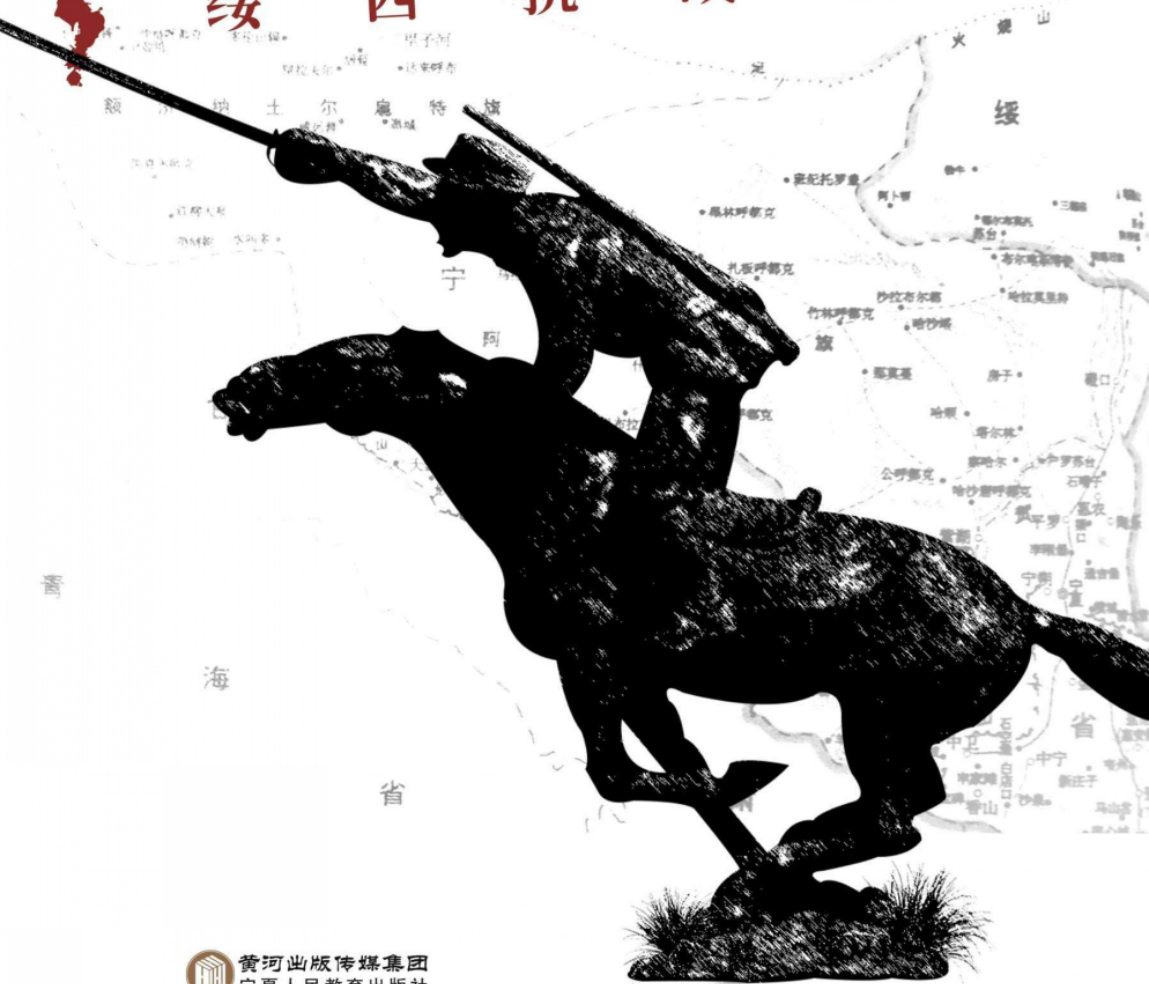


喋血 1941

马濯华◎著

绥西抗战往事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马濯华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宁夏文史研究馆研究员，宁夏日报报业集团编采。出生于“多慷慨悲歌之士”的燕赵之地，参加“三线”工业建设到宁夏银川。曾在国企大型机械厂开过机床，当过管理干部。后调入新闻单位任编辑、记者。上世纪“文学热”年代，曾于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剧本、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30万字，为银川文学青年的活跃人物。200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“绥西抗战往事”之《碧血1940》，2009年获宁夏第八次文学艺术奖长篇小说奖。《喋血1941》是其姊妹篇。一直致力研究绥西抗战史，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。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黄 健



20世纪40年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

浓郁悠远的西部人文景观再现

恢宏苍凉的草原自然景观再现

绥西抗战谱写了回、汉、蒙军民联合抵御外侮最悲壮的篇章

绥西抗战中作为主力军的宁夏军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和牺牲

历史 1941年2月，包头日寇、伪蒙军履冰过黄河扫荡，宁夏“西军”

与友军殊死抵抗，阵地“碎盾”；300多年沧桑的藏传佛教辉煌大寺王爱召遭抢劫轰毁。日军特务到绥西暗撒鼠疫细菌……

传奇 西军加强情报战，派年轻“夫妻”特工潜入虎穴侦察；和友军特

工配合，与敌酋舍命斗智；烧毁了日本烟土洋行，解救了慰安妇，策反了伪军阵前起义。血战突出包头……

群像 八路军女教导员遭遇战绝境中饮弹自尽；西军医官冒死进入疫区

用祖传秘方救治受害民众；杨家将后人痛心疾首不再为虎作伥；青年晋商保护新婚妻子打死日军军官，后成为谍报员；失去双臂的日酋借助“错介”剖腹；经历生死考验，假夫妻有了矢志不渝的爱情……

壮烈 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寇再过黄河劫掠，国、共军队及蒙古游击军

喋血抗敌；起义者击毙了西军在五原、恩格贝的宿敌；起义将领殉国；八路军骑兵营长炸毁浮桥后牺牲……

长篇历史小说

ISBN 978-7-5525-1055-3



9 787552 510553 >

定价 00.00元

喋血1941

——绥西抗战往事

马濯华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喋血 1941: 绥西抗战往事 / 马濯华著. -- 银川: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44-1687-7

I. ①喋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3842 号

喋血1941——绥西抗战往事

马濯华 著

责任编辑 王 慧 姜 楠

封面设计 星 秀

责任印制 殷 戈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出 版 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2646

开本 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张 33.25 字数 50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687-7/I·105

定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那一年，
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
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
那一世，
转山转水转佛塔，
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

——仓央嘉措

我生国死，我死国存。

——抗日名将马占山

真诚与正直的审美价值追求

——序马濯华长篇小说《喋血 1941——绥西抗战往事》

荆 竹

作家马濯华的小说《碧血 1940——绥西抗战往事》于 2008 年出版。时隔 8 年,它的姊妹篇《喋血 1941——绥西抗战往事》即将面世,可喜可贺。该书付梓之前,作者邀我写些文字作该书的序言。盛意殷殷,情不可却。近来翻阅书稿,颇多感慨。

抗战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,属于宏大叙事。而绥西抗战历史,看似为中华民族抗战之一隅,但日寇阴险毒辣,制造了我中华疆土分裂之局面,扶持德王成立伪“蒙古自治政府”,战争背景风云诡谲;因有黄河天堑之屏障,战事多发生于铁马冰河之境况下;复因汉、蒙、回多民族儿女团结对敌,空旷草原、丘陵和沙漠的战斗包括驰援策应,甚为艰难。这就要求作家通晓历史背景,全面勾画故事结构与缜密独特的情节,更须有精细描绘与融入抗战儿女英勇捐躯之精神内涵和艺术张力。

从创作主旨看,《碧血 1940——绥西抗战往事》(以下简称《碧血》)酣畅淋漓地书写了主人公的忠诚、勇猛和慨然;《喋血 1941——绥西抗战往事》(以下简称《喋血》)则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主人公的果敢、坚贞和智谋。《碧血》出版后,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。他们普遍认为,《碧血》作为一部重大抗战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,对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、符号真实与审美真实如何完美统一作出了可贵的探索。对《喋血》这部作品,我感到作者在原有创作基调上,又有较大推进与

提升,在细腻写人、注重文化、开掘人性方面,笔触深邃,匠心独运。其一,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,均为背景展示,作为前景的故事亦基本属于虚构;其二,融入了地域叙事、恩仇叙事、日常叙事等一般重大历史题材小说极少见的叙事策略。随之便产生了相应的审美惊喜:首先是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全书的精神依托及叙事框架,不仅保证了故事情节的意识形态承诺,而且保证了这部作品作为重大历史题材惯有的宏大叙事史诗品格。其次是由于出场人物和前景故事均为艺术虚构,艺术表现力得以极大释放,人物性格、情节冲突、结构层次、人物对话皆在艺术调度下展开,从而避免了一般重大历史题材常见的符号化尴尬。其三,由于地域叙事、恩仇叙事、日常叙事之融入,在表现符号真实的同时也增加了某些非符号真实的情节,使符号真实的现实存在形态更为真实化,更为日常生活化,大大增强了该作品的世俗感染力。

从艺术上看《喋血》的审美表达。我认为,文学表达是围绕着艺术造型而展开的。我之所以强调文学的表达操作对象(素材)的心理可塑性,是为了说明造型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;探讨文学表达操作规范,是为了洞幽作家的审美趣味与造型组合法则的关系;现在要问: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文学表达对素材进行分解与聚合,文学表达的原动力是什么?歌德说:“我把一些印象接受到内心里,而这些印象是感性的、生动的、可喜爱的、丰富多彩的,正如我的活跃的想象力所提供给我的那样。作为诗人,我所要做的事不过是用艺术方式把这些观照和印象融会贯通起来,加以润色,然后用生动的描绘把它们提供给听众或观众。(《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》第2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309-310页)”文学表达的原动力,正是指那种促使歌德将“这些观照和印象融会贯通起来”的审美内驱力。原动力在于作家要形象地传达主体对生活的某种审美把握。这种审美把握在未诉诸文字表达即作品定型前,它在作家心目中呈现为一种对历史、世界、人生中的总体性理解或体验。所谓总体性,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动力或表达能源,是发轫于他的社会阅历及其精神探索的深远视野,而并非一时一事之素材格局所能限定。某些足以标志作家的精神风貌的总体倾向,早在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碧血》中,就已作为某种定势沉淀在心底。马

濯华在《碧血》中就已从日寇火炮的弹片中悟出了世界之裂痕与人生之悲剧性。正是这种赋予哲理的人生顿悟,决定了作家马濯华对现实、历史、命运的总体理解,同时界定了他的文学素材领域和创作母题。比起沉稳凝重的总体理解与体验,琐碎素材闪烁的情致之光要飘忽微弱得多。一个作家要表达自己的一点主观感受并不难,难的是要在这感受中包含某种深刻、更普遍的总体性理解或体验。某些被人忽略的素材细节入书后所以璨若明珠,也是因为它已被嵌在了艺术化的世界图景上。艺术表达不同于科学表达,它不苛求自己回答世界是什么。艺术表达的使命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非实践意义的审美现实,来形象地传达作家对世界的总体性思考。《碧血》的叙事背景主要在宁夏,描写回族的民风民情、穆斯林社会生活多一些,宁夏“花儿”、秦腔、陕北民歌等元素融入其中;《喋血》的叙事背景主要在绥远,细写蒙古民族的精神风貌、藏传佛教地域状况则多些,晋绥“二人台”、山西梆子、“漫瀚调”等元素尽显其内。这些丰富多彩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,为长篇小说《喋血》的情节推进、人物塑造、场景烘托等,起到了“画龙点睛”的作用。首先,作者不是从脱离文学实际的抽象概念出发,而是从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出发,来建立长篇小说结构的。因为真实性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,而艺术审美化的表达则是真实性的集中表现,也是文学创作独创性的首要标志。别林斯基曾说:“创作独创性的,或者更确切点说,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,就是这典型性—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——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。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来写,每一个人都是典型,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。(《别林斯基选集》第1卷,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,第191页)”这就是说,作品的典型,即艺术审美化的表达是对现实中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特征之概括反映,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现,它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,因而使人有“似曾相识”之感,另一方面,它又是作家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发现和创造,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评价与情感态度,因而它又使读者感到新鲜、陌生,使之对生活的认识更深刻、感受更丰富。我认为马濯华创作的显著特征,正是这种能够让人物具有“十足的生活真实”和“独创性”的艺术审美表达能力。

其次,从作者马濯华的长篇叙事结构看,他是以对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

之对立关系的辩证理解为基础的。马兰草这个侠肝义胆的歌女,从万念俱灰欲出家为尼,到成为一名抗日女兵,再到成为一名特工,心理刻画细腻,情感发展与转折符合心理逻辑。她与司马服从命令假扮夫妻,到强烈要与其做真夫妻相随生死,转化自然细腻。人,都是文化的生成物。日本侵略者被中国人称为“鬼子”,可他们也是人,是日本文化的生成物。以往不少作品中,将鬼子军官符号化,像“一个模子”造出来似的。诚然,他们经过“洗脑”,是愚忠、狂热、凶残的,但他们也有思想、性格、观念之个体差异。经过与中国人的殊死抵抗,他们从蔑视到重视,直到敬畏和恐惧;只要是人,一般皆有其善恶之两面,该作品透视了“鬼子”由好战、厌战、怯战到反思之转化,均是符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;刻画其“蔑视弱者”“人格分裂”(适才赏花流泪,回身挥刀杀人)、“武士精神”及“注重耻感”等心理特质,非得从文化根源入手不可。包括诸如追魂、歌舞文化乃至冷血的日本“剖腹”自杀等,皆要求作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写作功力。别林斯基还说过:“在创作中,还有一个法则: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是整个特殊的人物世界的表现,同时又是一个人物,完整的个别的人物。只有在这条件下,只有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,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。(《别林斯基选集》第2卷,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,第25页)”可见,只有在共性与个性有机熔铸成完整的人物性格时,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典型。显然,从《喋血》的反面人物日军大佐野田花部的造型看,作家马濯华是做到了这一点。野田花部这个日本中年文化人,会说中国话,不仅懂得中国兵法,如对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之典故心领神会,而且谙熟中国古典诗词歌赋,略通中医医术,悉知中国历史人物,也懂些中国传统士大夫的“风骨”与“气节”。而主人公司马河山,这个年轻的西军医官,不仅家学渊源,医术精湛,通晓文学、历史、书法等,还有成熟的政治头脑,对日寇有强烈的国恨家仇,加之战场上枪林弹雨之经历,颇显军人之胆识与谋略……其实,长篇小说《喋血》采用的是艺术提炼的方式,将历史原型人物进行集中、整合、虚构,即以艺术真实的形态表现出来,这正是该部作品的突破。但此并非“唯艺术而艺术”之写作。我和濯华在一次交谈中,他援引军史学者萨苏著作作为据:日本甲级战犯、侵华大特务土肥原贤二,就是个“中国通”。他不仅精通中国话,且竟

然会说几种中国方言,那就是当年的“真实”。这使我感到释然,野田花部造型的成功,就在于其透视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欲吞中国之野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女鬼子”井香子这一人物造型。她跟随父母随殖民的“满洲开拓团”来到中国,中学毕业后因会说中国话而进入军队,旋即成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人。据说日军部队通常没有女兵,但培养间谍和特务则一直青睐女性。井香子以特务身份潜入国统区偷撒霍乱病菌,且凭空手道杀人不眨眼。但她也有一丝天良萌发,这个尉官逐渐滋生厌战、反思甚至叛逆情绪;她在醉生梦死状态中,由于青春期性压抑而受小岛诱奸时半推半就;她到蒙古族地区侦察召庙情况,又意识到广袤的中国永远不能被征服等心理;但她不遗余力地帮助长官野田对付司马河山,甚至为了效忠天皇身试“美人计”。应当说,这一造型是复杂的、细腻的,折射出了人性的多侧面与丰富性,其整个人物造型成功且独特。

杨云斋这个人物,其豪杰义气在《碧血》中铺垫充分。在《喋血》中,他爱国之心未完全泯灭,最终战场起义杀敌,他谙熟兵机运筹过人,起义中舍个人生死而顾全大局,是个转变了立场的英雄人物。熟知绥西抗战史料马濯华提及其人物造型,言称绝非空穴来风。他引据史料记载:“百灵庙大捷”后,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,“伪军旅长金宪章、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,1936年12月8日,石玉山部在阵地反正。9日凌晨,金宪章也率部反正,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,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,将其大部歼灭”。“1936年12月9日上午,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。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,伪旅长安华亭率领两个团、伪团长王子修率一个团,于1936年12月18日宣布反正”。所谓“一念成佛,一念成魔”,乃哲学范畴。浴血抗战中,须臾间,或生或死的严酷战争与人之命运,全方位地拷问着人性、道义和天良。它造就了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,也造就了无耻的汉奸。作家谙熟“这一个”(老黑格尔语)与人物“群像”之间的造型关系,如军阀马鸿逵这个人物,是《碧血》和《喋血》之贯穿角色。他为了维护其“家天下”的统治,动辄杀人,自诩“宁夏王”与活阎王。书中,他以大腹便便的肥硕“身段”反串京剧《起解》的小女子苏三,小丑一般作态

令人作呕。马濯华说,这个情节也不是向壁虚构,而是来自真实的文献记载。马鸿逵本身是一个多色彩的历史人物。又如“小人物”花子头,命贱如蚁,也是贯穿性角色,可他却能即兴编词“数来宝”,转辙押韵,出口成章,且内容饱含追求正义与公平,实际却是沦为乞丐的落魄之人。如此,“闲笔”则不闲。再如《碧血》中贻误军机的麻团长麻三,在《喋血》中再度现身,用“神枪擦顶”之骗术竟从刑场诈死逃脱,源于昔日江湖的细节,读来让人感到诡谲惊诧。

此外,长篇小说的“时间”也是《喋血》这部作品的重要架构元素,是作者具有如此叙述耐力的精神支撑点。其实,在这部小说中,我们面对的是文本内外的两个“时间”:即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。我们在重叠的时间中,渐渐清晰地看见了那个历史的叙述者。历史只有在时间之维度里才能找到自足之空间。在此方面,只有积蓄足够对生命体悟之经验,才会感受“历史时间”之律动。但叙述就是叙述,马濯华并没有使用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结构来修饰他的文字,而是以朴素的叙述方式追根溯源地讲述。一般的讲,人们始终在做的,是谋杀时间,扬弃时间,将时间空间化,以获取内心之平衡与平静。马濯华努力克服了时间之恐惧,收束住了历史时间之绵延流逝。克尔凯戈尔说:“回忆就是想象力。”但如何回忆,为何回忆,如何让七十多年前之细节获得“再生”,并且为此能再次感到灵魂之惊悸,这就不可能再依赖叙述经验了。那么,是什么激活并点燃了时光中的、记忆中的废墟?可以说,这完全是时间之力量。马濯华的叙述,又常常忘记叙述者应该具有的客观身份。我们甚至要说,“他”自己以自己的情感担当起了对自身之叙述,而且没有兑入种种后天意识到的欲望,但这种对叙事和被叙事不经意之混淆,并没有损害叙事之性能。当然,小说的本质无须像历史话语那样严谨、明晰、郑重和井然有序,它可以肆意扩张。也许,正是这种无度的自我精神扩张,滔滔不绝的自叙,掩盖或弥补了故事本身之直白,小说中的诸多人物,作为叙事引线,差不多是在极端个性化的独白里自言自语。可以说,“他”的所有行为情境并没有全部处于各个人物的精神遮蔽中,“他”的生命主题的懵懂与醒悟,显得头绪分歧,意向纷扰,但这毕竟是一段历史所产生的有疼痛之状态,这些,与整个20世纪精神性存在一起构成叙述的轴心。马濯华似乎无意通过叙述话

语复活那些凝固在历史背后的个人动机,因为他肯定清楚,历史永远只是一个盲点,个人才有可能鲜活的,重新发现“个人”及其在今天的价值,也许才是最有意义的。

绥西抗战,是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大局中的一个小局部。算是时人和后人视角下的偏远一隅,其过程往往被遗忘和尘封。可是汉、蒙、回军民不屈的殊死搏斗,却是波澜壮阔的。前文所说,《碧血》在2008年刚出版时,就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,此并非偶然。2009年,《碧血》获宁夏长篇小说奖。由于该作品从观念、结构、叙事、写法、语言乃至美感神韵上,在很多微妙的方面均有所突破,弥漫在作品中的一种久远的历史审美气脉也在悄然萌生。2015年,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《喋血》即已成稿,可谓双璧矣。

总之,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,这是21世纪长篇小说所要寻找和揭示的。长篇小说中的人物造型皆来源于现实生活(包括历史生活),但不是“镜子式”的反映生活。长篇小说的深度就是表达人物的深层心理与潜意识,从而揭示社会生活之本真。其审美广度就体现在小说有时是批判性的,有时是歌颂性的;有时是残酷的,有时是困惑的;有时是尴尬的,有时是骨感的,它浑厚多元的叙述视角赋予了长篇小说丰富的审美内涵。经典的长篇小说追求的就是生活的丰赡性,而并非只写丰富的生活。这种丰赡的审美价值追求是要立足于小说家的“真诚和正直”的,因为只有“真诚和正直”的小说家才能既冷静客观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性,又能体现作者的情感倾向,反映时代的理想追求。正如卢卡契所说:“伟大作家对真理的渴望,他对现实的狂热的追求——或者用伦理学术语来讲,就是作家的真诚和正直。……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,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,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。(乔治·卢卡契:《卢卡契文学论文集》第2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1年版,第53页)”21世纪长篇小说称得上“正直”的有很多,比如《白鹿原》《温故1942》等,而21世纪长篇小说中称得上“真诚”的则不多。我认为马濯华的长篇小说《喋血》,就是属于写得比较“真诚”的一部。读者在看惯了都市喧嚣的小说单调沉闷之后,也让人进入了一个真实性的历史审美世界。

真诚与正直，这是包括马濯华在内的 21 世纪长篇小说作家永远值得珍视和追求的审美价值取向。

是为序。

2016 年 6 月 6 日写，8 月 8 日修订于银川风声楼

（荆竹，研究员，文艺理论家。研究方向：20 世纪中国文论史案，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文学术传统。出版文艺美学专著《智慧与觉醒》，香港作家研究《追求真善美》，近代史学术专著《学术的双峰》等。论著《论审美体验与艺术踪迹》《论两种小说美学模态》《论艺术与自由精神》《艺术典型观变异》等数百篇（部），计 400 多万字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宁夏文联副主席。）

自序

马濯华

1941年正月十四,驻包头的日军踏过黄河的冰面,和南岸伪蒙军向达拉特旗的新民堡和王爱召一带扫荡,中国军队在新民堡、王爱召阵地和工事进行了顽强殊死的抵抗。主要部队有宁夏八十一军的二〇五团、二〇六团和晋陕绥二十二军的五一二团。日军依仗大炮和飞机最终突破阵地,把藏传佛教大寺王爱召内的财宝和文物悉数抢劫走,又用炮火轰毁了这一组300多年的辉煌建筑群。此战后,几百名殉国军人的遗体埋葬于斯。八十一军将士多数是回族,被民众称为“西军”,“西军墓”选定在新民堡的店壕村旁。60多年来,这段历史已被几近尘封,“西军墓”也几乎被人们遗忘。

2006年秋天,达拉特旗的女教师李瑞和田香兰,有感于某“西军”后人寻找烈士墓地所写博文的悲怆,有感于民族的昔日苦难,根据线索到新民堡乡去寻访。在店壕村,他们见到了亲历者——88岁的石伟士老人,也找到了“西军墓”。她们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博文:

“他们牺牲时,大多是十八九或二十出头的孩子啊!六十多年前,500多名回族‘西军’战士英勇捐躯,至今竟然无人问津。只有小鸟为他们歌唱,高大的杨树为他们守灵……只有一个当年的同龄人为之扫墓。那是一个叫杨三成的人,多少年如一日,每逢春节或清明,背着一大袋纸钱去祭祀烈士的英灵。只是他2006年没有再来,八十多岁的他去世了……”

“多少年来,宁夏烈士的家人思念他们,四处打听他们身归何处,家人们从幼童变成了白发老人,从青丝少年变作已故之人。而当年远行从军的亲人依然